

博物館、知識生產與市民參加：
日本地域博物館論與市民參加型調查

黃貞燕¹

The Museum,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On the Theory of Regional Museums and the Local Investigation with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Japan

Jan-Yen Huang

關鍵詞：日本地方博物館，公共性，知識生產，市民參加

Keywords: regional museums of Japan, publicity, knowledge production, citizen participation

¹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Museum Studies, Taipei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mail: swallow886@gmail.com

摘要

日本 1970 年代以降地方博物館實施的市民參加型調查，為博物館知識生產的公共參與提供了一種不同的實踐方法。其實施模式有兩個重要的特色：一是專業者（博物館研究員）與非專業者（市民）建構夥伴關係，共同生產有關地方的科學知識，既是博物館的研究與蒐藏活動，也具有地方環境教育的作用。此外，更重要的是，這是在日本地方博物館的治理觀之下發展出的新技術；日本的地域博物館論從社會教育的立場出發，強調博物館的公共價值在於有關地方的知識之建構以及確保市民學習權，更應與市民發展出夥伴關係，協助市民成為面對地方課題的主體。本文梳理日本戰後的地域博物館論述，對地方博物館治理的影響，以及市民參加型調查幾種不同的實施模式，並以巴瑞特(Jannifer Barrett)有關博物館知識生產與公共性的論述為基礎，檢討這種地方博物館實踐對於思考博物館知識生產與公共參與課題的意義。

Abstract

The local investigations with citizen participation conducted by regional museums after 1970s in Japan provide a new pattern for how participatory approaches could be adopted by museums in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his pattern has two important features: one is a team work by the experts (the curators) and non-experts (the citizen) to build up the science knowledge about the locality in partnership. And more importantly, this pattern is a new museography develop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governance of regional museums in Japan. The theory on regional museums in Japan was mainly develop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ducation, emphasizing that the public value of the regional museums is to produce and accumulate the knowledge of locality, and ensure the learning right of all the citizen. Furthermore, the regional museums should build up a partnership with citizen and play the role as facilitators to support citizen participation of local public issues. This paper reviews discussions of regional museums after 1950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governance of the regional museums. The different practice of the local investigations with citizen participation is also discussed. Jannifer Barrett's argument on the intellectual function of the museums and the role of the museums as public intellectuals is applied to exam meanings of this museum practice in Japan.

壹、前言：博物館、知識生產與市民參加

如何強化博物館做為公共場域、公共論壇的角色，乃是今日博物館的重要課題之一。其中，增進博物館與公眾，包括利用者（visitor）、觀眾（audience）或相關社群（community）的關係，被認為是一個重要的手段，具體的做法如改善博物館的可及性，留意博物館相關社群的多樣性與需求（Sandell, 1998; Fleming, 2002），甚至開放博物館過程的公共參與，例如為展示詮釋加入觀眾意見，與相關社群共同規劃展覽或教育活動，或者如公募市民參加博物館評議會等等。換言之，在增進博物館與公眾關係的課題上，目前的相關研究指出，博物館可以／應該改善其管理與觀眾服務，提高博物館對多元文化（種族、階級、性別等）相關議題的關注，並在做為博物館專業職能象徵的展示與教育之操作上嘗試新的技術，讓公眾得以參與博物館的知識生產或相關事務的決策過程。

有關於博物館的知識生產與公共參與，巴瑞特（Jannifer Barrett）提出更基進的意見，將博物館的知識性功能（intellectual function），以及博物館研究員（curator）的角色與職責帶入相關論述。巴瑞特指出，蒐藏、研究、展示與教育等知識性功能，乃是博物館做為一個公眾文化場域持續發展的關鍵，擔負這些工作的博物館研究員，既是博物館知識生產的核心，也是與觀眾接觸的介面。過去將博物館生產知識、發揮公共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職責的核心聚焦在博物館研究員身上，但是博物館這種機構更具有扮演這種角色的潛能，這個觀念將可重新建構博物館研究員的角色、職責、甚至涉及專業培育的方法論。過去，研究員被認為是知識生產的權威，是博物館內的全知者，因此反而成為公眾參與博物館的屏障。然而，面對博物館知識生產與公共性課題，研究員也應該扮演「協助者」（facilitator）或「適當的參與者」（appropriate participant），甚至讓非專業者加入知識生產的團隊，以助博物館有關知識生產的實踐（curatorial practice），增強博物館做為公共場域的意義（Barrett, 2011：143-163）。

有關非專業者加入博物館知識生產的實踐，巴瑞特引用克瑞普（Christina F. Kreps）提出的「適用博物館學」（appropriate museology）概念，認為典範型的博物館專業職能應該發展出一種以社群為基礎的、能涵納地方知識與資源的運

作方法，以使博物館更能符應特定的地方與社群需求。例如，博物館應重視地方既有的、傳統的物件照護與知識生產的方法，並與博物館專業機制整合，為地方社群建立參與博物館實踐的管道，除了能提高社群對博物館的興趣，亦有助博物館發揮協助照護地方上有形或無形文化遺產的功能（Kreps, 2008）。

日本 1970 年代以降地方博物館實施的市民參加型調查，為博物館知識生產過程的公眾參與提供了一種不同的實踐方法。所謂的市民參加型調查，其基本型態是由多數非專業的居民參與博物館有關地方的調查活動，目前所見案例調查主題以地方的自然與生態居多，調查成果除了為博物館增加標本蒐藏，累積解讀地域生態的第一手資料，也被運用到博物館展示之中，成為有關地方環境與生態教育的內容，而實地調查的經驗也成為市民認識地方自然、關注地方環境保全課題的發端。

從博物館知識生產與公共參與的角度來看，市民參加型調查的實施模式有兩個重要的特色。與克雷普研究的印尼案例相反，日本的博物館學藝員²為研究、蒐藏等專業職能的運作發展出非專業的公眾也能參與、對知識建構有所貢獻的機制。市民參加型調查的隊伍由專業者與非專業者共同組成，調查的架構與方法的規劃，以及資料的整理與解讀，需要高度專業知識；調查所需規模，如果沒有多數居民參與則無法完成，而地方居民的參加，也提升了共同調查活動的地方環境教育意義。

此外，更重要的是，市民參加型調查的實施，乃是受到日本地方博物館治理觀的影響。日本的地域博物館論指出，從做為社會教育機構的立場出發，博物館的存在價值（公共意義）在於以徹底的地方研究為基礎，確保居民學習的權利，並與地方居民建立夥伴關係，協助居民面對地方課題。此論述興起於 1960 年代，雖經衍釋與補充，然其核心觀念一直延續至今，認為促進市民參加，提高市民的博物館素養，是顯示博物館存在價值的重要手段（水嶋英治、栗原憲司，2009）。

為了解日本地方博物館市民參加型調查實施的背景、運用方法與意義，

² 「學藝員」是日本指博物館內負責研究、蒐藏、展示等研究性質工作者，相當於西方所說的「curator」。

本文梳理日本戰後的地域博物館論述，對地方博物館治理的影響，以及市民參加型調查幾種不同的實施模式，最後檢討這種獨特的地方博物館實踐對博物館知識生產與公共參與課題的啟發。

貳、日本戰後地方博物館論述

從博物館史的角度來看，雖然日本早於 1920 年代就出現了第一個由地方公部門設立的博物館³，戰前各地也設立了為數眾多的鄉土博物館，但是從博物館與地方的關係來看，認為地方的博物館應有獨特的使命與經營哲學的想法，卻要到 1960 年代末才出現。在此之前，所謂的「地方博物館」，或是從設立者的角度，指由地方公部門設立的博物館，而其型態幾乎都是以既有國立博物館的縮小版來想像；或是從蒐藏的性質，指蒐集保管地方鄉土資料的博物館，經常被稱為「鄉土博物館」。也就是說，這裡所指的「地方」，或者是相對於國家或中央的行政單位，或者是一種狹義的鄉土概念（布谷知夫，2003）。

戰後由於地域主義思維的啟蒙，日本經濟與社會體制逐步走向地方分權，地方的治理注重地方意識、認同與自立，所謂的地方，才逐漸轉變成為一個具有各自獨特歷史、自然、產業、人文的真實存在，特別是 1970 年代以降日益顯著。日本地方公部門設立的博物館，即在此背景下蓬勃興起，被視為帶動地方發展的媒介之一，與地方發展計畫關係密切。由於地方發展方法論的轉變，公立博物館設置與經營的行政論述，也出現不同的理論依據，如社會教育政策、定住圈理論、文化行政理論，以及偏重地方文化與觀光產業的地方自立理論等。日本戰後出現的地方博物館以公立館居多數，而其設置由行政論述主導，與地方發展計畫關係密切並具多樣性，成為戰後博物館發展的重要現象（黃貞燕，2009）。

然而，促成地方公立博物館設置的行政論述，長於建設而短於經營，善於描繪願景而拙於細膩的行動哲學與計畫，日本地方博物館的經營，很大一部分是在逐步摸索、嘗試錯誤的狀況下前進。對戰後地方博物館的發展，日本的博物館史指出「偏離博物館法精神」、「觀光型博物館陸續登場」、「做為地方博物

³ 1926 年成立的東京府立美術館。

館之問題意識的貧乏」等等現象，正是前述問題的反映（森田恆之、伊藤壽郎，1978）。

對地方博物館的治理提出明確主張的，始於 1960 年代，並如同接力賽一般，後浪接前浪，逐步地對相關論述與實踐加以擴充、細膩化或省思，成為戰後日本地方博物館論述的核心。這些論述主要來自博物館現場的學藝員與博物館學研究者等，以日本的博物館法（1951 年成立）所提示的社會教育機構性格為根本，從博物館與地方的關係，提出蒐藏、研究與教育之應有的方針，主張博物館應著重地方的蒐藏與研究，促進並保障地域居民的學習權，總合複數領域的博物館更能符合地方的需求等。1980 年代，伊藤壽郎（1947-1991）提出「第三世代博物館論」與「地域博物館論」，乃是受到少數具有革新意識的地方博物館實踐之啟發，並就此前諸論，加以進一步理論化、體系化的成果，成為日本地方博物館的理想，對於日後地方博物館的論述與行動有一定的影響（布谷知夫，2003）。

伊藤的「第三世代博物館論」，從歷史發展與社會需求的角度提示博物館社會定位與功能的轉變。伊藤將博物館的發展分為三個世代，第一世代的博物館以蒐藏、保管具有稀少價值的資料（寶物）為使命，第二世代博物館蒐藏的類型開始多樣化，而以資料的公開為使命，第三世代的博物館則是基於地方社會的需求而運作，並以市民的參與與體驗為經營軸心。伊藤指出，這三種世代的博物館雖然是前後出現，但今日呈現並存的現象（伊藤壽郎，1993：141-154）。

「地域博物館論」則從博物館與所在地方的關係，提示新的博物館治理哲學，主要論點有二：第一，主張以往運用通論式的科學方法來蒐集與詮釋地方資料的做法，應該轉向以地方課題為軸心，總合地運用科學方法來發現地方資料的價值。第二，不同於以往把市民當作觀眾，是博物館啟蒙對象的觀念，主張市民應為認識、解決地域課題的主體，而博物館則應運用其各種功能來培育這樣的精神。也就是說，「地域博物館」是一個以地域課題為主軸，透過博物館的蒐藏、研究、展示、教育等活動，引領地方居民認識、發現地方，甚至解決地方課題的場所。伊藤認為地域博物館論逆轉了以往博物館經營的方法論，乃是一個激進而有革命意味的理論。「地域博物館論」所描述的地方博物館像，其

實就是第三世代博物館的理想典型。伊藤認為，地方中小型博物館，由於具有與市民發展密切關係的條件，正是實踐第三世代博物館理念的最佳舞台，其中，又以博物館設備與學藝員體制都達一定程度的縣立級博物館，更具優勢（伊藤壽郎，1993：155-164）。

伊藤等有關地方博物館的論述，可說是日本在地博物館學的代表。比起戰前博物館做為創設近代國家、移植西方國家制度一環的國家論述，以及戰後依附地方發展計畫的地方論述，地域博物館論乃是地方博物館的在地實踐、反省與展望的總合，反映了日本地方博物館獨特的地域觀、治理哲學與方法論。如果對照歐美以生態博物館論、社區博物館論為地方型博物館論述的核心，伊藤的論述則是針對蒐藏、研究、展示、教育四大功能並俱的地方中小型博物館，著重博物館的社會教育性格，並特別強調專業博物館學藝員的重要性。伊藤將縣市立博物館視為論述的主要對象，也可以說是日本戰後普設縣市立博物館現象的反映。

從博物館治理的角度來看，伊藤壽郎有關博物館與地方連結的主張，有幾個重要的方法論：

- 一、地方博物館應該參與地方社會文化建構工作。地方博物館不是自成體系、自我完結的知識庫，博物館不是目的本身，而是發現問題與對應問題的手段。
- 二、博物館與地方居民不但關係密切，更應該發展出對等的夥伴關係。
- 三、博物館應該透過其獨特的專業功能（蒐藏、研究、展示、教育）之運用，來實踐上述兩個目標，因此，具有專業訓練的博物館學藝員有其重要性。

從日本博物館史來看，以伊藤為代表的地域博物館論的確具有革命性的意義。目前針對伊藤博物館論影響之深入研究還有限，總體來看，至少可以舉出以下幾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地方博物館關注的知識內涵，從以科學方法為核心生產的通則性科學知識，轉向以地方田野為基礎的地方科學知識，並講求運用不同科學領域的方法論，例如，自然史博物館從自然史知識，轉向關注環境與生態，並注重自然與人文的關聯性。1980年代後半以降，以環境與生態問題為主要課題的博物館前後誕生，例如1989年開館的千葉縣立中央博物館，1992

年開館的兵庫縣立人與自然博物館，以及 1996 年開館的滋賀縣立琵琶湖博物館等，比起傳統的自然史博物館，更顯示了博物館高度的地域關懷與地域研究取向。此外，1990 年代甚至出現「參加型博物館」一詞，成為地方博物館標榜全新經營哲學的流行語（布谷知夫，1998：15）。

參、地域博物館論之博物館與市民

在伊藤的地域博物館論中，市民與博物館關係的建構，是地域博物館論的核心，也是最為關鍵的方法論。伊藤想像地方博物館所面對的，不是一般而沒有個別性的觀眾，而是在地方生活、具有高度自主意識，與博物館有共同連帶關係的市民，市民的參與，也是地域博物館理念實現的必要條件。

伊藤有關市民與博物館關係的論述主要有三個面向：

一是博物館與市民學習。市民不是博物館啓蒙的對象。博物館應保障市民學習的權利，協助市民進行自我教育，成為面對地域課題的主體（伊藤壽朗，1993：159-160）。

二是博物館與市民參加、體驗。市民主體的參加與體驗是博物館經營的主軸，博物館除了應提供市民主體參加博物館活動的場域，並提供不同階段持續學習的機會，也應逐步累積市民學習的成果，再公開還原給地方（伊藤壽朗，1993：132、142、153）。

三是博物館與市民運動：博物館應該與地方市民團體有所連結合作，但是與市民運動之間的關連，應該限定在教育性的面向，市民運動的主題不能直接成為博物館的課題，而應轉化為適合博物館對應的課題，予以協助（伊藤壽朗，1993：123-124）。

伊藤有關博物館與市民關係的論述，乃是受到數個地方博物館實踐的啓發，並以教育學者海後宗臣（1901-1987）的教育論為基礎總合而成。伊藤引用海後宗臣將近代教育分為「知識者養成型」以及「生活者養成型」兩種教育觀，指出既有的博物館採取第一種，而地方博物館應該採用第二種。「知識者養成型」教育觀，乃是近代國民教育的目標，透過教科書的編輯，提供所有國民相同的教育內容，以教導具有普遍性和通用性的知識為主，因此與生活現場有一定的

距離。「生活者養成型」教育觀，從生活之中發現教育課題，教育的內容具體而具有地方性，也應該在地域的實際生活中進行學習。教育方法則重視學習者自我學習、思考、表現能力的培育，學習內容只是培育這種能力的媒介（伊藤壽朗，1993：160-162）。

強調推動與生活有關的學習，並培育具有自主學習能力的市民，伊藤論述的精神與戰後社會教育方針一致。戰後 1949 年社會教育法成立，1951 年以社會教育法的精神為基礎成立博物館法，因此博物館被定位為社會教育機構，必須支援社會教育政策相關計畫。1970 年代地方的社會教育政策即強調，公民館、集會所等社區活動中心，應促進市民的相互交流，並提升市民意識，支援市民自主進行與生活課題密切相關的活動，培植能自主實施學習、休閒、文化等活動的市民團體，並培育團體活動所需的指導者；公共圖書館除了提供市民圖書的借閱服務，也應推動市民讀書會的成立（田中兄一，1998）。

然而，當時社會教育政策之中博物館的角色，被定位為收集、保存、展示地方文化財的機構（田中兄一，1998：64），不像公民館或圖書館被鼓勵與市民的學習建立動態關係。也就是說，即使如「生活者養成型」教育觀已經是地方社會教育政策的理論基礎，但是對於地方博物館如何參與並沒有提出具體的方法論。因此，從社會教育的角度，伊藤等的地域博物館論之貢獻在於將社會教育理論的精神運用到博物館，將靜態的博物館轉變為能動的機制，而且比起由公民館、圖書館以體育、休閒、教養型活動為主，以博物館為基地的市民培育，則在地方學習、地方意識、公共參與方面，描繪了更大的願景。

肆、地域博物館論之市民參加

伊藤有關博物館與市民的主張，可以視為地方博物館教育方法論，包括市民做為學習者的性格、教育活動的規劃方針、以及地方社會資源的運用方針等。不過，有關市民的參加與體驗，由於強調博物館應開放市民主體性參與博物館事務，其實已經超越了教育論的範疇，涉及到博物館治理的課題，在此市民的角色也超越了向來輔助性質的博物館志工定位，可以說是地域博物館論中最激進的主張。

雖然「市民參加、體驗」的主張在地域博物館論中佔有重要地位，但是伊

藤並沒有提出具統合性的論述，而以不同的地方博物館實踐做為具體做法的說明，也就是說，「市民參加、體驗」是一個受博物館實踐啟發的總合性概念。如果將伊藤所舉的代表案例加以整理，可得以下三大類(伊藤壽朗，1993：112-118、142-146)：

第一類型是著重體驗型的學習活動。1980 年代，實施體驗學習工作坊的博物館還非常少見，因此如宮城縣美術館、Iwaki 市美術館⁴的創作工作坊等，受到伊藤的注目。根據伊藤的說明，所謂的「參加、體驗」指的是重視學習的過程而不是最後的結果，博物館提供給市民的，不以知識的量取勝，而應重視學習過程透過體驗獲得具有深度的理解(伊藤壽朗，1993：150-152)。

第二類型是市民參加型的地域調查與研究工作，伊藤舉例的實施館如橫須賀市博物館(1954 年開館)、大阪市立自然史博物館(1952 年設立)、東京都高尾自然科學博物館(1966 年開館，2004 年閉館)、平塚市博物館(1976 年開館)等。這種類型的活動顯示了幾個重要的原則：持續而長期的計畫，由博物館學藝員與市民共組團隊，調查成果具有博物館資料價值並能持續累積，部分成果在博物館以展示的形式呈現，或者以市民研究報告的形式發表等。伊藤認為，這類的活動讓博物館成為市民進入地方田野的入口，能培育以博物館為舞台的市民研究者，促進了日本學術研究之業餘主義(amateurism)的發展，因此給予高度評價(伊藤壽朗，1993：112-118、142；君塚仁彥，2003：24)。

第三類型是由市民團體利用博物館舉辦自主規劃的講座、講習或展覽，如千葉市加曾利貝塚博物館以及川崎市立日本民家園等。伊藤所舉的這兩個例子中，活躍於博物館舞台的市民團體，都是由於參加博物館舉辦的市民講座而誕生的(伊藤壽朗，1993：114-116)。博物館培育了市民團體，又提供了場地讓市民團體自主規劃學習、交流活動。

重視學習是這三類活動的共通點，第一類型是指體驗型學習，第二與第三類型則強調學習者的主體性。伊藤一方面給予這些地方博物館實踐高度評價，一方面也指出，這類市民參加活動必需注意做為博物館教育活動的品質問題，

⁴ 日文原文「いわき市美術館」。由於日文原文非漢字，以「いわき」日文讀音 Iwaki 標示之。

如何從生活之中找出具有教育意義的內容並轉成博物館活動，還有活動成果的專業性問題，具有專業訓練的博物館員如何與市民一同進行調查研究，又如何獲得有意義的成果，都是想推動「市民參加」的地方博物館不可避免的問題（君塚仁彥，2003：28-30）。伊藤之後，幾乎都省去「體驗」二字，直接使用「市民參加」的說法，「參加型博物館」一詞的出現與流行就是例證。

市民參加的理念，如前所述，1990年代以降蔚為流行。不過，研究者也指出，當時對於何謂「參加型博物館」並沒有共識，實施的狀況也不同，最積極的做法如以開放市民參與博物館事業為目標，而最普遍的情況是指體驗型展示的實施（布谷知夫，1998）。1999年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一方面顯示了對於「市民參加」理念具體作為的衍釋，一方面也可以略窺當時博物館實施的狀態。這份問卷針對日本全國 800 個歷史類博物館實施市民參加現況進行調查，有效回答達 428 館。關於市民參加的具體辦法，該問卷中彙整了三種類型：（一）參加博物館調查研究活動、（二）參加博物館的展示活動、（三）博物館與學校、市民團體的合作（金起範、朴燦一、宮崎清，2001）。

這份問卷調查關於博物館蒐藏研究活動與市民參加狀況的結果如下：

參加狀況	比例
未參加	68.7%
參加	31%
•以調查研究一員身分參加	5.3%
•參加資料的整理工作	12%
•以蒐集作業的助理身分參加	17%
•從選定蒐集調查主題的階段開始參加	7%

關於博物館展示活動與市民參加狀況的結果如下：

參加狀況	比例
未參加	75.7%
參加	24%
•以展示營運工作的助理身分參加	8.7%
•以展示設置工作的助理身分參加	5.8%
•從展示企劃階段開始參加	13.5%

關於博物館與其他博物館、學校、市民團體合作的方式與實施狀況如下：

合作狀況與未來規劃	比例
與其他博物館已有合作計畫	70.4%
未來希望和其他博物館有所交流合作	82.5%
與學校/社會教育機構已有合作計畫	54.4%
未來希望和學校/社會教育機構有所交流合作	77.7%
與地方市民團體已有合作計畫	33.2%
未來希望和地方市民團體有所交流合作	47.5%

與地方市民團體已有合作計畫的博物館，合作形式與實施比例如下：(一) 資料相互借用 (16.7%)；(二) 資訊的交流 (29%)；(三) 共同調查與研究的實施 (15.9%)；(四) 共同舉辦展示、教育等推廣活動；(26.1%) (五) 舉辦共同企劃的活動 (23.2%)；(六) 共同出版活動 (7.2%)；(七) 人員交流與協辦活動 (15.9%)；(八) 設施或設備相互間的開放或提供 (37.7%)；(九) 共同實施相關宣傳 (5.8%)；(十) 其他 (3.6%)。該問卷也指出，博物館推行市民參加型活動的確對入館人數有所幫助，此外，館方則指出實施市民參加經常遇到的困難如專業館員不足、場地或設備不完善，以及未能建立對應的體制等，而博物館舉辦相關活動則經常遇到參加者素養、訓練不足的問題（金起範、朴燦一、宮崎清，2001）。

這份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實際上推動市民參加的館舍約有三成，若要達到伊藤地域博物館論主張的對等夥伴關係，則比例更低⁵。不過，這份報告卻不能顯示實施館舍在實踐技術方面的努力與創新。雖然只有少數館，但是不斷地摸索市民參加理念的實踐技術，例如「市民參加型調查」、「市民展示室」⁶，「市民學藝員」制度⁷，或者由博物館推動後援民間團體的成立等⁸。這些新機制的出

⁵ 這份問卷調查是針對歷史類博物館所進行，但是目前有關推動市民參加的博物館案例介紹，主要以自然史類型博物館為主。可以合理地推測，如果針對自然史類型博物館進行同樣的調查，實施館舍的比例應該會提高。

⁶ 實施館舍如相模原市立博物館與滋賀縣立琵琶湖博物館。分別參見 <http://tsunagunpo.exblog.jp/8226021/>、<http://www.lbm.go.jp/active/service/index.html#1-1>（瀏覽日期：2011 年 2 月 8 日）。

⁷ 例如東史民俗博物館 <http://www.city.ritto.shiga.jp/index/page/28038631ebf534240765e64d0d03c3d3/>、飯田市鄉土館 <http://www.city.hanno.saitama.jp/kyodo/siminsanka.html>、袖ヶ浦市鄉土博物館 <http://www.sodegaura.ed.jp/sodehaku/simingakugeiinn/simingakugeiin.html> 等等（瀏覽日期：2011 年 2 月 8 日）。

⁸ 如大阪市立自然史博物館推動成立由地方居民運作的「大阪自然史研究中心」。參見瀧端真理子，2002、2003。

現與影響，不可小覷。從個案研究可知，少數持續推動市民參加的博物館，已能顯現逐年累積的成績與影響，證明了市民參加的方法論，並不只是紙上空談。

伍、市民參加型調查與博物館

由非專業者的市民參與博物館有關地方的調查研究工作，常見的型態如協助研究員進行標本或資料整理等，分擔研究工作中需要大量而反覆性勞力的部分，或者將研究型的田野調查活動規劃為單次性教育活動，帶領市民／參加者一同走訪地方田野。日本地方博物館所發展出的市民參加型調查，可說是日本地方博物館實踐中，一種具有原創性的新博物館技術⁹，也是最能彰顯地域博物館論精神者。

在日本，大規模生物調查的實施可追溯至 1960 年代，當時由於開發造成的環境破壞帶來重大社會問題，相關計畫希望透過生物調查來掌握環境污染的實態，但這類調查需要一定專業訓練，非人人可以參加。一般市民參與的大規模生物調查首見 1971 年兵庫縣，民間社團「自然保護協會」為了促進居民關心生活週遭環境問題，開始嘗試規劃一種讓一般市民也可參加的環境生物調查模式，鎖定長足蜂、蝸牛與蒲葦三種生物。1974 年大阪府民間社團「還我自然！關西市民聯合」延續同樣思維，選定以蒲公英為主題的調查活動，由於蒲公英的親近性，品種判別方法較為簡易，調查結果的解讀也較為具體，使得這個活動不但號召了許多一般民眾參與，調查結果也能受到肯定（脇田健一，1994）。此後，蒲公英調查每隔數年進行一次，逐漸整合地方社團、學校與博物館，參加地區也從大阪府逐步擴大，最近一次於 2010 年舉辦，參加地區已擴及西日本十九個府縣，參加人數達 10 萬人¹⁰。

1974 年的市民參加型蒲公英調查，啓發地方博物館開始推動類似的活動。

⁹ 此為原琵琶湖博物館學藝員布谷知夫先生的意見，2011 年 3 月 12 日筆者透過電子信箱詢問相關問題所得回覆之一。其實，市民參與環境調查的模式並非日本原創，但博物館藉之發展成符應其治理觀的技術，的確是日本地方博物館獨特的實踐。

¹⁰ 參見「蒲公英調查西日本 2010」活動官網 <http://www.nature.or.jp/Tampopo2010/Tampopo-index.html>（瀏覽日期：2010 年 2 月 12 日）。

1970、80 年代，推動市民參加型調查的代表館關東地區如平塚市博物館、川崎市青少年博物館、厚木市鄉土博物館、橫須賀自然與人文博物館等，關西地區如大阪市立自然史博物館等（浜口哲一，2000），1990 年代，新開館的琵琶湖博物館的加入最受注目。

1980 年代中期起，由於中央省廳推動的計畫，使得市民參加型環境調查活動更為普及，認知度也大幅提高。日本環境廳於 1984 年起每隔數年推動全國型「生活週遭生物調查計畫」¹¹，公開募集參加者，只要是小學生以上，沒有其他條件。這項計畫的主事者雖然是中央省廳，但從企劃、推行、資料整理與後續分析等，地方博物館的支援都不可或缺。同時，在市民參劃的地方行政方針下，也有為數不少的地方環境局參考環境廳做法推動地方版的調查活動¹²，並設置如「市民調查員」、「自然環境觀察員」等制度招募參加者，由於調查結果經常做為地方環境計畫的參考，市民參加型調查被轉化為市民參與地方公共事務的一種機制。

承上述，1970 年代後半以降，在環境省廳局行政系統、地方博物館與民間社團的推動下，市民參加型生物調查逐漸成為日本環境教育的一種基本形式。中央環境廳推動的全國型調查計畫的意義，在於全日本同時進行同一基準的生物調查，但各地參加狀況的落差，以及有關紀錄資料正確性的疑慮，都影響了調查結果的參考價值（日本自然保護協會，1985）。博物館規劃執行的市民參加型活動，不但調查結果更為細緻，由於與博物館研究、蒐藏、展示、教育機能的整合，環境教育的意義或者有關地方公共意識的啓蒙，也得到較好的成績。此外，環境行政系統所推動的主要是「指標生物調查」類型，而博物館規劃推動者較為多元化，從進行的方式、條件和意義來看，可大分為三種類型：指標

¹¹ 環境廳的「生活週遭生物調查計畫」，乃是國家主導「自然環境保全基礎調查」之一環。該計畫從 1973 年啓動，由專業團隊分別就陸域、水域、陸水域、海域與生態等領域的生物與環境狀態進行有計畫的長期調查，以調查結果做為各層級自然保護行政與地域計畫的基礎。其中，只有 1983 年推動的「生活週遭生物調查計畫」採取市民參加的型式，主要目的在於啓蒙市民關注環境問題。參見 http://www.biodic.go.jp/kiso/fnd_f.html（瀏覽日期：2011 年 2 月 12 日）。

¹² 根據 1991 年日本野生生物研究中心的報告書指出，當時有 14 個府縣、60 個地方推動類似的市民參加型環境調查活動。參見《日本野生生物研究センター》，1991。

生物調查型、地方自然誌建構型，以及總合環境教育型。以下就三個類型的代表案例加以分析，包括博物館治理方針、調查活動的實施方式、成果與影響。

一、指標生物調查型

指標生物調查，或者稱為環境指標種調查，是市民參加型調查最普遍的類型，如蒲公英調查、環境廳的生活週遭生物調查，都屬此類。所謂指標生物調查，乃是透過對某個特定條件敏感的生物為媒介，藉由對該生物生息狀況的調查間接掌握環境的變化，該生物則稱為指標生物（松宮弘幸，1974）。此種調查原是為掌握公害污染狀況而實施，調查的實施或資料解讀都需高度專業知識，之後在指標生物的選定或調查結果的判讀，發展出適合大多數非專業者進行的模式，轉化為適於市民環境教育的手段。

指標生物調查之所以具有環境教育意義，除了這是一種學習自然知識的方法，更在於透過自然生物的觀察，體會人與環境的密切性。因此，市民參加型調查所選定的指標生物，並不是用來掌握複雜的環境污染問題，而是藉以理解人類生活與社會發展對環境帶來的影響。市民參加型調查指標生物的選定原則如下：可以做為理解環境變化的指標，例如都市化、外來種侵入狀況等；在人類生活週遭生息而且具有親近感的生物；容易發現、種類判別也較為簡易的生物；可以由非專業者進行調查，而且調查活動對其生息不會有太大影響（日本自然保護協會，1985）。

1974年發展出來的蒲公英調查，就是典型案例。蒲公英調查的目的，一方面紀錄這種植物的生息狀況，一方面透過生息條件不同的在來種與外來種之分布與消長，掌握地域自然特性與都市化狀況，因此調查結果能做為地域自然與社會變遷等的一種紀錄¹³。由於難度不高、可接受不特定多數居民參加、適合大規模進行、成果又易見等，成為市民參加型調查中的基本主題。

博物館的實施案例，最早、也是最具代表性者為平塚市博物館（圖 1）。自

¹³ 參見「蒲公英調查 西日本 2010 年」活動官網 <http://www.nature.or.jp/Tampopo2010/Tampopo-index.html>（瀏覽日期：2011 年 1 月 13 日）。

1978 年起持續推動的「大家一起來調查」指標生物調查活動，陸續調查蒲公英、青蛙、蟬殼、淡水魚、燕子等等生物生息狀態（浜口哲一，1998、2000）。該館是伊藤地域博物館論屢屢提及的案例館之一，伊藤壽朗（1993：95-98）指出，1976 年開館的平塚市博物館，是日本第一個在博物館條例中明列研究田野範圍的地方博物館，第 4 條第 1 項指出：「收集、保管、展示有關相模川流域的自然與文化之實物、標本、模寫、模型、文獻、圖表、照片、幻燈片等博物館資料」，明確博物館研究對象，打破行政區劃之界限，打破人文與自然領域的界限，開啓總合型地域博物館之先例。平塚市博物館以舉辦有關地方、豐富多樣的學習活動著稱，有許多活動一直延續至今（向井田善朗、熊谷智義、広田純一，2003）。學習活動只有少數是自由參加，大部分採「年度會員制」，參加者必須事前報名，並且必須以持續參加一年為目標¹⁴。與市民建立密切、長期共同學習的關係，是平塚市博物館教育推廣活動的方針。



圖 1. 平塚市博物館（攝影／黃貞燕）。

地方的田野調查，被視為博物館發展的基礎。平塚市博物館「大家一起來調查」活動，雖然召集一般市民參加，但被定位為博物館的地域研究工作，以完成高度參考價值的成果為目標。環境行政系統推動的調查，成果受自由報名參加者居住地分布狀況影響，而平塚市博物館則預先將調查全域分設調查地

¹⁴ 參見該館官方網站 http://www.hirahaku.jp/kyoushitsu_circle/index.html（瀏覽日期：2011 年 2 月 8 日）。

點，參加者被分派不同區域完成調查，調查結果經二度確認後，解讀與分析交由博物館員進行，而紀錄與採集標本的整理、生物分佈地圖的製作，都由參加者共同完成，並成為博物館展示與教育的資源（圖 2）。從調查、資料整理與分佈圖的製作，參加者參與整個過程、分擔責任也分享實質成果（浜口哲一，1998、2000）。



圖 2. 平塚市博物館常設展「地方的生物地圖」一景（攝影／黃貞燕）。

二、地方自然誌建構型

以地方自然誌建構為目標的市民參加型調查，以大阪市立自然史博物館（圖 3）為代表，該館也是啟發伊藤的案例之一。大阪市立自然史博物館設立於 1952 年，訂定以追求學術價值與成績為目標，並發展出博物館研究者與市民共同進行地方自然誌調查、標本收集的特殊模式，今日不但建立 140 萬件具相當規模的地方自然標本收藏，也以自然史業餘研究者的重要據點而聞名。該館的博物館之友會，從一個協助博物館進行調查、出版、觀眾服務的館內組織，2002 年轉型為一獨立運作的非營利法人「大阪自然史中心」，與博物館簽訂互助協定，分擔博物館的工作。近年，博物館的定位從「自然史研究」正式變更為「地方的自然誌資訊中心」，擴建新館增設「大阪的自然誌」常設展（圖 4），繼續以扎實的研究工作為基礎，藉由對地方自然的研究與教育，成為一個引導市民進入田野的窗口（瀧端真理子，2003）。



圖 3. 大阪市立自然史博物館
(攝影／黃貞燕)。



圖 4. 大阪市立自然史博物館擴建新館常設展「大阪的自然誌」一景，展示大阪各區的地景、地質、代表動植物標本等（攝影／黃貞燕）。

大阪市立自然史博物館的設立，有賴後來擔任第一任館長的筒井嘉隆、自然史研究者以及被稱為「町人學者」的業餘研究者之共同努力。為了收集博物館標本，筒井積極連結大阪地區的業餘研究者，由於筒井對於社會教育的熱情，身邊吸引了許多專家與非專家，初期館務的發展也有賴地方研究者、學校老師等組成的後援會，協助博物館進行標本的整理與修理、發行普及型刊物等等（瀧端真理子，2002）。

1960 年代，第二任館長千地萬造同樣強調博物館建立學術價值的重要性：「以調查、研究為基礎，從地方的自然與身週遭的現象出發，是地方自然史博物館的原則」、「長年累積所建立的蒐藏，必然在分類學、地方的生物誌與地質誌上建立學術研究的價值與貢獻，如此博物館不只是一個社會教育機構，而是一個在地方研究上不可或缺的設施，如此才能穩固博物館的地位。」（瀧端真理子，2003：16）

1970 年代，博物館的靈魂人物、學藝員日浦勇為博物館的研究目標與方法帶來新風氣。日浦勇提出「徹底的地方主義」之概念，認為地方博物館的出路就在對於「地方」的徹底研究與展示，例如大阪的植物、昆蟲與生物，雖然從自然史研究的角度來看是一個很小的領域，但是只要在這個主題上有第一流的研究成績，也是其他館所沒有的。日浦勇鼓勵博物館學藝員建立自己的同好社團，他的名言「學藝員應該培育同好社團！」、「一個人帶一個同好社團！」等，

讓後輩學藝員留下深刻印象。日浦勇認為應該以專業標準來帶領社團的活動，藉此培育業餘者成為獨立的研究者，未來可以協助學藝員的研究與資料整理工作，也可以增加地方自然史的研究人力（和田岳，2005）。博物館學藝員的編制雖然僅 15 人，為了吸引有志者，該館每年平均舉辦超過 200 次的觀察會或講座（佐久間大輔，2010）。此外，還建立了一個特殊的制度，館內設有觀眾服務櫃檯，由學藝員輪班坐鎮隨時對應市民有關自然史調查研究的問題。

2003 年的資料指出，截至當時由博物館學藝員成立帶領的同好社團一共有 22 個。這些團體的活動方式與參加人員性質，各式各樣，從學術研究目的較高的，到僅僅只是田野踏青觀察的都有。這些同好社團的確培育了不少可以獨立作業的自然學者，也有後來獨立出來自組社團持續調查活動，也有延展到學校教育或地域活動的例子。培植地方民間社團，也是博物館扎根地方的重要途徑（瀧端真理子，2003；佐久間大輔，2009；和田岳，2009）。

由學藝員領軍的同好社團，學習的主要內容是自然觀察與標本製作。該館學藝員認為，學習如何採集與製作標本是導引市民仔細觀察、紀錄自然的手段，也是深入體驗、學習地方生態的方法，在地居民透過標本的觀察製作學習地方自然，也是生物多樣性管理上重要的一環。博物館稱這些參與自然觀察與標本製作的業餘者為「市民科學者」（佐久間大輔，2010）。同館學藝員也指出，要如何帶領非專業市民觀察田野，是促使自身重新向地方學習的好機會（初宿成彥，2002）。

除了由學藝員帶領成立同好社團外，也積極帶動相關社團的連結交流。大阪地區與自然相關的社團，都可免費利用博物館的會議室、實習室等舉辦活動，博物館一年一次的「大阪自然史嘉年華」活動，成為大阪地區自然關係社團彼此交流、招募成員最重要的機會。藉由這些規劃，使博物館成為地方上相關團體重要的活動據點。該館整合博物館之友會會員與地方同好社團共同完成大型的地域生態調查，例如 2007 年到 2010 年推動的「淀川大圖鑑」調查計畫，參加者共 200 人，分為 14 組分別負責淀川兩岸不同的生物與水質之調查，調查期間每年數度舉辦成果發表會，最後的調查成果於 2010 年於館內以展覽形式公開（圖 5）。



圖 5. 大阪市立自然史博物館整合地方同好社團共同完成的「淀川大圖鑑」田野調查計畫成果展一景，展示在淀川兩岸不同區段所採集之生物標本（攝影／黃貞燕）。

大阪市立自然史博物館的例子之外，其他代表案例如神奈川縣 1979 年起推動「神奈川縣植物誌」調查計畫，整合縣內包括平塚市博物館在內的數個地方博物館，採市民參加型調查模式，投注十年努力，於 1988 年出版調查成果。平塚市博物館於 1987 年起實施「相模川踏查」總合型市民參加型調查活動，跨民俗、考古、地質與生物等領域，就相模川流域兩岸進行總合調查，1993 年出版調查成果《相模川事典》，屢屢成為行政系統擬定地方環境保全計畫的重要參考（浜口哲一，2000：103-129）。

三、總合環境教育型

總合環境教育型調查的模式以指標生物型調查為基礎，但是相關調查延展到人與社會的變化，因此在環境教育上產生更大的影響。最著名案例是滋賀縣立琵琶湖博物館（1996 年開館，圖 6）所實施的「大家的螢火蟲調查計畫」。該館是受第三世代博物館論啟發的代表館，設館時即以「人與環境」、「人文與自然」的關係為核心關懷，以成為引導居民走入地方田野、關注地方環境保全課題的媒介，創造地方上人與人交流契機的平台為目標¹⁵。（圖 7）

¹⁵ 參見該館官方網站有關「基本理念」說明：http://www.lbm.go.jp/active/about_us/idea.html（瀏覽日期：2011 年 2 月 13 日）。

承繼地域博物館論的理念，在有關博物館與地域關係的課題上，琵琶湖博物館提出許多創新的實踐技術，被視為地方自然類博物館的新典型，關鍵原因即是該館對於博物館研究工作與博物館學論述的並重。該館在籌備室期間（1992-1996）即積極與地方民間團體與居民交流，聽取居民的意見，當時的學藝員以己身擅長的环境社會學理論為基礎，希望博物館未來在居民面對地方環境問題方面有所貢獻，但同時也意識到，如果缺乏博物館學的觀點，相關議論只會停留在地方運動的層次，對博物館的治理沒有建樹，成為該館關注博物館學論述的開端。開館後感受更深，於2000年研究編制正式改組為三大領域，有關地方的研究總合為「環境史」與「生態系」兩大領域，並增設「博物館學研究」領域，擔負有關如何實踐博物館理念與研究成果的研究工作。琵琶湖博物館認為，研究工作是博物館所有事業的基礎，也是品質良否的關鍵，但唯有有意識地輔以博物館學的檢討與論述，才有助博物館的實踐（滋賀縣立琵琶湖博物館，2006：102-104）。



圖 6. 滋賀縣立琵琶湖博物館
（攝影／黃貞燕）。



圖 7. 滋賀縣立琵琶湖博物館常設展「湖的環境與人的生活」入口，地面是巨型的滋賀縣空照圖，地方居民可以透過放大鏡找出自己家屋所在（攝影／黃貞燕）。

承繼第三世代博物館論的理念，琵琶湖博物館提出，觀眾不應該只停留在「觀看」的階段，而應該成為博物館活動的主體，因此將博物館「觀眾」稱為「利用者」，並標榜成為「以利用者為主體的博物館」、「由館員與利用者共同進行研究、展示與教育交流活動」的「參加型博物館」。該館為「參加型博物館」提出細膩的主張：（一）博物館對於所有年齡、階層與興趣的利用者，都能提供

適當的對應並使獲得滿足感。(二)博物館能提供、或協助規劃由利用者為主體、表達自己意見的活動。例如為參加型調查成果舉辦發表會或出版，日常的博物館活動，也為利用者規劃能直接表達意見或參與的機制，甚至協助居民組成同好會或社團，持續地進行相關活動。(三)博物館能夠規劃進階型活動，以帶領居民一步步持續相關活動。例如參加戶外觀察活動之後，還可以參加進階型的研討活動，或者由博物館協助居民組成的同好會等民間社團發展進一步活動，或者活用民間社團的研究成果等（布谷知夫，1998）。

琵琶湖博物館所實施的「以利用者為主體」的活動有三大類¹⁶。一是「仲介制度」¹⁷，凡認同博物館理念的地方社團可以向博物館申請登錄，一經登錄後，民間社團可以得到博物館的協助進行相關活動，或者在館內舉辦展示、教育等活動。2010 年有 15 團體登錄、成員共 300 人，幾乎都是有關地方動植物、地方史的相關社團¹⁸。

二是「田野報導者計畫」(field reporter)。這個計畫從開館第二年開辦至今，每年度招募有興趣的居民，進行以一年為期的田野調查計畫，依項目分為觀察與訪問兩種調查手法，期間參加者必須持續地提供調查結果。這個計畫又名為「地方博物館員計畫」，將參加者視為在館外工作的博物館員。到目前為止調查過燕子、蟬、稻田裡的生物、過年習俗、清明節祭祖習俗等等項目¹⁹。

三是「參加型調查」。琵琶湖博物館從籌備期間就開始與地方社團與研究機構合作，選定與生活、環境密切相關的主題逐年進行，例如螢火蟲、蒲公英、蝸牛等等，此外，調查主題擴展到如風向、積雪等非生物的自然現象²⁰，以及人

¹⁶ 參見該館官方網站有關「交流與服務活動」說明：<http://www.lbm.go.jp/active/service/index.html#1-1>（瀏覽日期：2011 年 2 月 13 日）。

¹⁷ 「仲介制度」之「仲介」，日文原文為「はしかけ」，乃是為男女間說媒一事的地方語，博物館將之轉成指連結地方不同團體交流之意。詳見官網 <http://www.lbm.go.jp/hashikake/index.html>（瀏覽日期：2011 年 2 月 3 日）。

¹⁸ 仲介制度的具體實踐案例，可參見青木伸子、北村美香，2006。

¹⁹ 參見官網 <http://www.lbm.go.jp/active/service/index.html#1-2>（瀏覽日期：2011 年 2 月 3 日）。

²⁰ 積雪的調查目的，主要是氣候與積雪狀況關係的觀測與紀錄；風向的調查目的，除了從地球物理學角度進行氣象觀測外，也同時用以驗證地方漁夫有關風向的俗諺之真確性。參見戶田孝，風が吹けば桶屋がもうかる？！，<http://www.lbm.go.jp/publish/umindo/volume3/umind3f.html>（瀏覽日期：2011 年 2 月 25 日）。

交活動的水環境、水邊遊戲等，是一大特色²¹。募集地方居民擔任調查員，依據操作參考手冊進行觀察、紀錄，再由博物館、社團或研究機構的成員匯整觀察資料，運用地圖、照片與手繪稿等轉成展示內容，也印製報告書，使調查成果以可見、可共享的形式呈現。由於如上的設計，使得地方居民在個別進行調查後，也加深對地域的了解並對調查工作產生新的動力。

各種參加型調查活動中，「大家的螢火蟲調查計畫」突破向來類似計畫的格局，結合人文與自然兩方，具有高度總合環境教育意義，也喚起居民的環境行動。1989年起由滋賀縣琵琶湖研究所發起，乃是為了掌握水環境變化的計畫之一，之後地方社團「水與文化研究會」²²以及琵琶湖博物館結成團隊，持續推動十年、共計3500人參加（水と文化研究会，2000：10-11）。本計畫多次獲得有關環境保全、生活文化創造或地域振興等獎賞的肯定²³。

「大家的螢火蟲調查計畫」的參加者除了觀察螢火蟲的出現狀況之外，還包括觀察地、日期、時間、天候等，特別是有關觀察地點之水量、垃圾分布、護岸方式以及週遭建物與照明狀況等，透過輔助表格將觀察結果紀錄或繪圖下來。螢火蟲約於每年5月到7月之間出現，調查也集中在這兩個多月。持續進行十年後，從歷年來螢火蟲的生息變化，觀察環境的變化等，解讀出螢火蟲生息與地方氣候、環境與社會變化的影響（水と文化研究会，2000：10-27）。

計畫執行第十年，以回顧的方式總合地整理了十年來螢火蟲與環境的變化，還新增一項問卷調查，以了解這項連續調查對地方生活帶來的影響²⁴。從問

²¹ 參見官網 <http://www.lbm.go.jp/active/service/sanka/index.html>（瀏覽日期：2011年2月3日）。

²² 水與文化研究會於1989年由滋賀縣內有志者結成的地方社團，第一任代表為滋賀縣立大學教授高谷好一，其後由嘉田由紀子續任。嘉田由紀子1982年到1996年任職琵琶湖研究所，1997年起擔任琵琶湖博物館學藝員，也是這兩個機構與民間社團緊密合作的關鍵人物之一。參見水與文化研究會官網 <http://koayu.eri.co.jp/Mizubun/>（瀏覽日期：2011年2月5日）；以及水と文化研究会，2000。嘉田由紀子於2006年當選滋賀縣知事，並連選連任，是日本目前唯一一位博物館研究員出任地方首長的例子。

²³ 如1992年獲「東京創造大賞」、1996年獲「Han-Roku文化財團地域振興賞」、1999年獲「環境廳水環境賞」、2001年獲「環境水保賞」。參見「水與文化研究會」官網 <http://koayu.eri.co.jp/Mizubun/>（瀏覽日期：2011年2月20日）。

²⁴ 該問卷調查針對學校以外的個人參加者共300人，回收問卷共129人。參見水と文化研究会，2000：15。

卷調查結果得知，由於參加這項計畫，地方居民與環境連帶感提高了，家庭的共同話題、近鄰的交流也增多了，已經被淡忘的往昔生活景象，又重新回到人們的交談中。此外，爲了護衛螢火蟲的生活環境，也出現居民團體的環境保全行動。例如水環境的維護行動，或者如天津市的居民，由於參加這項計畫的契機，發起守護、認識地方自然的活動。當市內的千丈川進行護岸工程時，地方居民聯合起來將岸邊的螢火蟲幼蟲與蟲卵遷移到其他安全的地方，並要求護岸工程採取未來螢火蟲依然可以生存的方式進行；市內一所幼稚園舉辦一個連續四年的螢火蟲說故事活動；地方上甚至自行組成「螢火蟲守護會」，一起觀察地方螢火蟲的活動，每年舉辦「千丈川螢火蟲研究發表會」，從小學生到大人，或是發表觀察日記，或是發表吟詠螢火蟲的短詩（水と文化研究会，2000：45-133）。這次回顧式的問卷調查結果，更加明確這項計畫的意義。本調查成果也成爲琵琶湖博物館常設展「湖的環境與人類的的生活」展示內容之一（圖 8）。



圖 8. 滋賀縣立琵琶湖博物館「大家的螢火蟲調查計畫」成果展一景，從電腦終端機可以看到接受訪問的參加者之所見與感想（攝影／黃貞燕）。

這類型參加型調查的設計有幾個基本原則²⁵：（一）發掘業餘者也可以執行的調查項目，調查目標不是單純的學科學習，而是對身週遭的環境之現況與變遷，從自然科學與歷史文化的角度整合地進行調查與探究，讓居民能切身體會自身與環境的關係。（二）調查活動本身的設計必須能讓參加者樂在其中，也必

²⁵ 參見官網 <http://www.lbm.go.jp/active/service/sanka/index.html>（瀏覽日期：2011 年 2 月 3 日）。

須設計一份簡明易懂的調查表。(三) 重視參加者提供的訊息，調查的結果必須以簡單明瞭的形式整理、呈現出來。(四) 重視每個人的想法與創意，並以各自的姓名發表。(五) 建置調查計畫所需的軟硬體資訊系統，有助調查資料的匯整與公開，利用網路、出版與展示等各種不同的方法來發表調查成果。例如，螢火蟲的個別調查結果統一送交由水與文化研究會進行整理與資料輸入，並轉成資料庫。資料庫是參加者共有的，資料庫的資訊也可以不同方式彙整比較，例如同一觀察地點、地區別、日期別等等。

螢火蟲的調查計畫之所以喚起居民的環境行動，計畫規劃者指出，這是因為參加者除了藉由調查了解生態環境，透過螢火蟲也彷彿看到於自己於生態中的處境，因此對自我與環境的關係有了更深刻的體會。關於環境問題，專家進行的專業調查與研究當然非常重要，但是地域居民環境意識的喚醒，為保護活動奠定社會基礎，同樣重要。市民參加型調查，希望透過參加者的實際體驗，強化環境與生態學習，也是一種為地方上不同背景的居民建立相互交流與溝通管道的設計。世代住於此地的人、新遷入的人、行政人員與專家，從商與務農等等，每個人的生活經驗與利益立場都不同，為了共同的環境保全問題，必須建立共識。琵琶湖博物館將參加這類調查活動的市民稱為「業餘科學家」，調查所得成果稱為「生活知」。從生活者的觀點來呈現環境課題，也成為琵琶湖博物館進行環境研究與展示的理論根據（嘉田由紀子，1990；布谷知夫，2006；畑田彩，2007）。

陸、結語

日本的地域博物館論與治理觀，可以說與巴瑞特在公共性議題上強調博物館知識生產重要性、以及博物館應扮演公共知識分子角色等論點一致。日本的地域博物館論從社會教育的立場出發，強調博物館的公共價值在於有關地方的知識之建構以及確保居民學習權，而博物館的研究工作正是實踐兩者的必要條件；同時，這個理念也影響了博物館研究員專業發展與市民（公眾）關係的方向：地方博物館的研究不應是通則性的科學，而應是以地方田野為基礎，為地方建構實證的、科學的知識，博物館研究員應與市民建立夥伴關係，透過博物

館的不同功能協助市民成為面對地方課題的主體。

有關博物館、知識生產與公共參與，日本地方博物館所實施的市民參加型調查提供了一個不同的模式：當面對有關地方生態、人文與民俗之知識建構，博物館研究員有可能為專業者生產知識的方法，發展出一種可以涵納地方居民參與的模式，不但可以推動大規模的田野調查，參與地方田野的經驗更成為居民關注地方的契機，特別在有關地方的公共性議題，例如環境問題，其影響更具意義。

不論何種模式，從公共性角度觀之，非專業者參與博物館知識生產的過程，關鍵在於共同生產的知識應該具有其獨特意義與價值，更應有助提升博物館的公共性意義，而不僅是形式上的整合或開放而已。日本地方博物館市民參加型調查的實踐，並不是專業調查的簡易版而已。對博物館來說，這些大規模的、實證的地方科學知識建構，市民的參加不可或缺；對市民來說，由專業者帶領的地方田野觀察經驗，甚至成為地方知識生產團隊之一員，是促發地方學習以及關懷地方課題，更是建立地方連帶感的契機；對地方來說，這個實踐建立了有關生態、環境等的地方田野知識，在相關問題上能成為與行政或專家說法抗衡的實證資料。

在日本的案例中，我們也看到建立方法論與創新機制，對於兼顧博物館專業與公眾參與的實踐之重要性。幾個地方博物館為市民參加準備了不同的途徑：如大阪市立自然史博物館著重以同好會的形式培育可以獨立作業的業餘科學家，協助博物館的研究、標本蒐集製作工作，也增加了地方研究的人力資源；而滋賀縣立琵琶湖博物館則強調應透過參加型調查的形式，將居民對於生活週遭的經驗與感知轉化、建構為地方科學知識，也提出細膩的方法論與機制，以實踐其「參加型博物館」的理念。因此，其他本文提及而尚未深入觀察、評析的創新機制，如市民學藝員制度、仲介制度等等，亦有待進一步了解。

此外，日本的案例也提示了一個新的問題，博物館面對的公共性課題可能因區域性文化社會脈絡而有所差異。日本的研究者指出，日本有關博物館與地域社會課題的思維和歐美不同：歐美博物館強調如何對應多民族與多元文化的地域社會中各個不同個人的需求；而日本的地方博物館則面對地方的所有居

民，強調如何培育具有地方意識與地方關懷的居民，並關注如何透過博物館活動使得居民有所改變（布谷知夫，2005：26-29）。日本地域博物館論提出的公共性課題，設定為居民學習權的保障，關注地方公共課題意識的培育，以及紮根地方的知識建構等，這除了與日本博物館法中博物館社會教育機構的定位有關，也與日本戰後走向地方分權、強調地方意識的背景密切相關。博物館之公共性課題，不只是管理與服務、強化社會意識與創新專業操作模式的問題，更不能靠某些實踐模式的套用來達成。如何在各自的文化社會脈絡中找出公共性課題的核心，以此為中心發展創新機制，應該是博物館面對公共性議題挑戰的第一課。

參考文獻

- 王嵩山主編，2009。製作博物館。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黃貞燕，2009。行政、地方營造與博物館：試析日本 1970 年代以降地方公立博物館設置運動的行政因素與影響。王嵩山主編，製作博物館，頁：303-318。臺中：自然科學博物館。
- 水と文化研究会編，2000。みんなでホタルダス：琵琶湖地域のホタルと身近な水環境調査。東京都：新曜社。
- 水嶋英治、栗原憲司，2009。公立ミュージアムの存在理由。
- 日本自然保護協会，1985。指標生物：自然をみるものさし。東京都：平凡社。
- 日本野生生物研究センター，1991。「環境指標種調査」調査手法等検討調査報告書。
http://www.biodic.go.jp/reports2/4th/sihyo/4_sihyo.pdf（瀏覽日期：2011 年 2 月 15 日）。
- 田中兄一，1998。小金井市における戦後社会教育政策の展開と市民活動，研究紀要：付博物館実習記録，4：61-82。
- 布谷知夫，1994。くらしと結びついたタンポポ，瓦（琵琶湖博物館（仮称）開設準備室ニュース）。<http://www.lbm.go.jp/publish/kawara/kawara3.htm>（瀏覽日期：2011 年 2 月 8 日）。
- 布谷知夫，1998。参加型博物館に関する考察－琵琶湖博物館を教材として，博物館学雑誌，23(2):15-24。
- 布谷知夫，2003。日本における地域博物館という概念，博物館学雑誌，28(2):15-24。

- 布谷知夫，2005。博物館の理念と運営：利用者主体の博物館学。東京都：雄山閣。
- 布谷知夫，2006。身近な課題から始める環境教育，日本生態学会誌，56:158-165。
- 伊藤壽郎，1993。市民のなかの博物館。東京都：吉川弘文館。
- 朴 燦一、宮崎 清，1998。日本における今日の地域博物館志向の歴史的背景：地域博物館研究（1），デザイン学研究，44(5):69-78。
- 向井田善朗、熊谷智義、広田純一，2003。市民団体の育成を通じた地域づくりに対する博物館の役割：野田市郷土博物館と平塚市博物館の比較，農村計画学会誌，22:247-252。
- 君塚仁彦，2003。博物館展示論の視座から「地域博物館論」を読み直す，大阪人権博物館紀要，7:14-52。
- 初宿成彦，2002。市民参加の大規模調査と生涯学習。環瀬戸内地域（中国、四国地方）自然史系博物館ネットワーク推進協議会編著，地域の自然の情報拠点：自然史博物館，頁：34-43。東京都：高陵社書店。
- 佐久間大輔，2009。博物館が地域に根付くしかけ。大阪自然史博物館、大阪自然史センター編，自然史博物館を変えていく，頁：82-83。東京都：高陵社書店。
- 佐久間大輔，2010。自然系博物館の未来（第 11 回）：市民とともに良質なコレクションを築くために，科学，80(4):415-419。
- 和田岳，2005。博物館における市民を巻き込んだ調査研究：大阪市立自然史博物館の事例，日本生態学会誌，55(3):466-473。
- 和田岳，2009。博物館とサークルー博物館コミュニティの幅を広げる。大阪自然史博物館、大阪自然史センター編，自然史博物館を変えていく，頁：84-94。東京都：高陵社書店。
- 青木伸子、北村美香，2006。琵琶湖博物館はしかけグループ「びわたん」の活動紹介：博物館における協働モデルの提示，博物館研究，41(2):16-20。
- 金起範、朴燦一、宮崎清，2001。日本における教育普及活動推進に向けての博物館と地域住民・諸団体との連携：日本・韓国の歴史系博物館の教育普及活動に関する研究（3），デザイン学研究，48(3):9-18。
- 松宮弘幸，1974。生物指標実験法：水生生物を用いた環境評価。東京都：講談社。
- 畑田彩，2007。博物館と生態学（6）：博物館学芸員と地域住民による自然環境保全活動，日本生態学会誌，57:443-447。
- 浜口哲一，1998。生きもの地図が語る街の自然。東京都：岩波書店。

- 浜口哲一，2000。放課後博物館へようこそ：地域と市民を結ぶ博物館。東京都：地人書館。
- 浜田弘明，2003。市民と地域の博物館：相模原市の博物館建設を通して，博物館問題研究，29:17-29。
- 脇田健一，1994。参加型調査と博物館の役割：堀田満氏に聞く，瓦（琵琶湖博物館（仮称）開設準備室ニュース）。<http://www.lbm.go.jp/publish/kawara/kawara3.htm>（瀏覽日期：2011年2月8日）。
- 黒沢惟昭，1997。市民社会と社会教育（3）：新しい社会形成とボランティア・ネットワークワーキング，研究紀要：付博物館実習記録，3:1-18。
- 森田恆之、伊藤壽郎，1978。博物館概論。東京都：學苑社。
- 滋賀県立琵琶湖博物館，2006。滋賀県立琵琶湖博物館研究部 10年の歩み。滋賀県立琵琶湖博物館。
- 嘉田由紀子，1990。住民参加による環境調査の理念と実践：生活現場での環境認識と Communication，日本科学教育学会研究会研究報告，4(5):41-46。
- 瀧端真理子，2002。大阪市立自然史博物館における市民参加の歴史的検討（1）：大阪市立自然科学博物館時代，博物館学雑誌，27(2):1-17。
- 瀧端真理子，2003。大阪市立自然史博物館における市民参加の歴史的検討（2）：長居公園移転以降，博物館学雑誌，28(2):1-22。
- Barrett, Jennifer, 2011. Museums and the Public Sphere, pp. 143-163. London: Wiley-Blackwell.
- Kreps, Christina F., 2008. Appropriate museolog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3(1): 23-41.
- Fleming, David, 2002. Positioning the Museum for Social Inclusion. In : R. Sandell (Ed.), 2002, Museums, Society, Inequality, pp. 213-224. London: Routledge.
- Sandell, Richard, 1998. Museums as agents of social inclusion.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17(4): 401-408.